

附录 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郑君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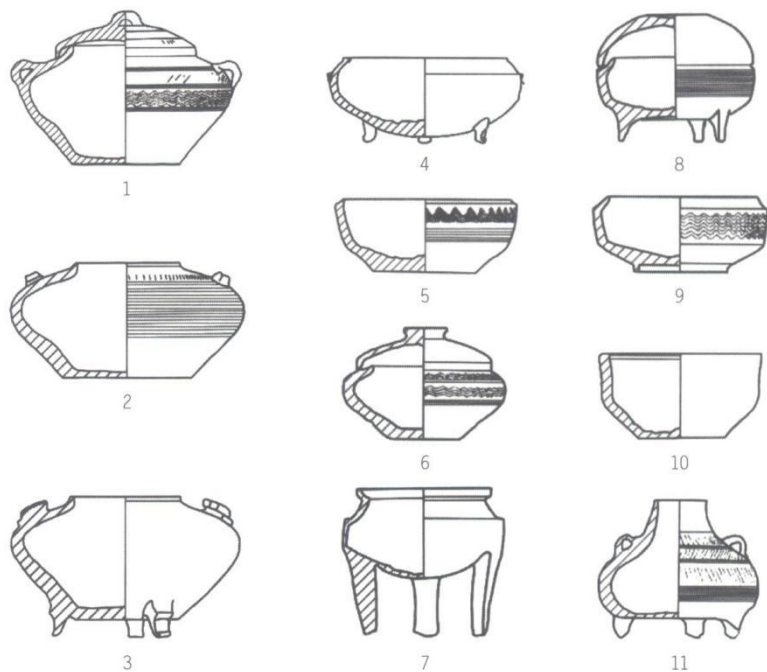
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以下简称“银山岭墓地”）1974年发掘墓葬165座，其中110座被推断为战国墓^[1]，另文发表资料的有汉墓45座（其中西汉前期13座）^[2]。银山岭墓地是岭南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材料，一些学者认为银山岭战国墓年代为西汉前期，实际是汉墓（南越国墓）。本文就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分期等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一、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争议

最早提出银山岭战国墓已经进入西汉纪年的是《广州汉墓》，指这批墓葬出土陶器与广州西汉初年墓相同，“原报告推定的年代（战国中、晚期）偏早了，似应定为西汉早期”^[3]。徐恒彬注意到“平乐银山岭出土大量铁器，与其他战国墓不同”，认为“这部分墓葬的年代应晚于战国，出土铁器不能代表秦以前南越的冶金水平”^[4]。黄展岳推测“平乐银山岭战国末汉初墓，估计是西瓯抗击秦兵南下的屯戍吏卒所遗留”^[5]。

其后，黄展岳指出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贺县西汉早期墓形制相同，出土器物基本一致，铁器比例大，认为“这批铁器是在秦平岭南之后从中原带来的”，战国墓与西汉早期墓“彼此交错在一起，墓制相同，出土物又相似”，当“同属于南越王国早期”^[6]。黄展岳、麦英豪称银山岭战国墓为反映特殊屯戍生活的“南越西瓯戍卒墓”^[7]。容达贤认为大量随葬铁锄与战国西瓯、汉代骆越的农业发展水平不符，推断墓地年代属秦代，墓主“是被秦王朝统治者从岭北地区迁徙到岭南西瓯人居地充当戍卒的楚故地居民”^[8]。

李龙章认为“岭南地区出土铁器遗存的年代上限均未超出秦汉时期”，银山岭战国墓的“甗、三足甗、盒、三足盒、釜形鼎、杯、钵等陶器，无论是器形、纹饰、施釉、刻划记号等方面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南越王墓同类器完全相同”，特别是三足壶（M119:12）“与广州汉墓I型3式匏壶基本相同，属岭南汉代典型陶器”，绝不见于两广先秦墓葬（图一）；银山岭战国墓“的确较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中出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为早，并且基本不见广州汉墓常见的几何戳印纹陶，这正是发掘报告误将其年代定在战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年代仍处在秦汉时期，与博罗银岗二期遗存的年代基本相同”，即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9]。



1. I 式甑 (M15:5) 2. II 式甑 (M115:8) 3. 三足甑 (M3:13) 4. 三足盒 (M92:8) 5. 三足盒 (M108:4)
6. III 式盒 (M18:4) 7. II b 式盒 (M73:5) 8. I 式盒 (M93:4) 9. I 式杯 (M129:1) 10. III 式鼎 (M15:4)
11. 三足壶 (M119:12)

图一 银山岭“战国墓”部分与广州汉墓相似陶器^[10]

主张银山岭战国墓已经进入西汉纪年的学者主要依据有三，即墓葬形制、陶器与银山岭汉墓和广州等地西汉前期墓相同，铁器数量多。但这并不具有绝对说服力。就前两点而言，窄长方形墓坑、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卵石是岭南战国墓和西汉前期墓共有的形制设施，部分陶器未必能够代表这批墓葬的全体年代或主体年代。就第三点而言，虽然学术界近年来倾向于认为“岭南地区跨入铁器时代，是伴随着秦平岭南而开始的”^[11]，但是银山岭墓地所在的湘桂走廊楚文化进入较早，还需要排除这批铁器与楚地的关联^[12]。

极端言之，银山岭战国墓与岭南西汉前期墓的共性，逻辑上也可以逆推为银山岭西汉前期墓实际是战国墓。要之，银山岭战国墓已经进入西汉纪年的观点虽然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并未成为定论，一些晚近著述或者仍然视其为战国遗存^[13]，或者在汉墓研究中不涉及^[14]。显然，在岭南战国秦汉考古学研究尚有许多空白、缺环的情况下，这一观点有必要进一步论证。

二、银山岭战国墓的主体年代

鉴于有些问题暂无从深入讨论，需要论证的内容集中于两点，一是如何看待这批墓葬的地域（或族属）特征，二是其与广州等地西汉前期墓的共性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银山岭战国墓出土许多楚式器物，墓葬形制、陶器等与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多具共性，属于楚墓^[15]。资兴旧市战国墓地^[16]的发掘报告虽然将“普遍出土

了百越文化的遗物”的第Ⅳ类墓视为楚墓，但是已经指明“并不是楚人的墓，墓主的族属很有可能是为楚人所征服的越人”，其实可以径称为越人墓。资兴旧市等地西汉墓^[17]几乎不见楚文化因素，其西汉前、中期的A类墓出有坛、罐、纺轮等越式陶器和越式铜鼎，报告即推测墓主为越人后裔。李龙章认为湖南、岭南两地越族青铜文化是同一民族文化的早、晚期类型，“平乐银山岭墓葬属青铜越墓”^[18]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桂东北地区在东周时期主要受到粤北和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19]，报道有灌阳古城岗^[20]、灵川马山^[21]、贺州高屋背岭^[22]、兴安石马坪^[23]等战国至西汉前期墓地，银山岭、古城岗、石马坪等地虽然见有楚文化因素，但是整体而言属于岭南百越文化体系。湖南资兴与广西平乐银山岭等地战国至西汉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共性（窄坑墓、青铜兵器、陶纺轮、米字纹等），宜视为岭南百越文化体系在湘南方向的延伸，而非相反。

岭南地区的铁器化进程始自秦平定岭南之后，银山岭墓地凹口锛、条形镞、釜、中长剑“这类铁器显然是直接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传入的”，锻釜铁斧、凿这类器物“应当是模仿中原地区同类铁器、采用发生于中原地区的锻釜技法在当地制造的”^[24]。白云翔的认识排除了这批铁器与楚文化的关联，并且为银山岭墓地的铁器墓进入秦汉纪年提供了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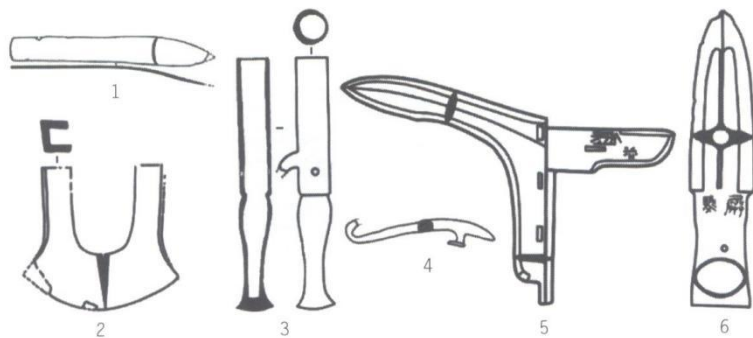
李龙章在银山岭“战国墓”中识别出一批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的陶器，我们暂称为“文景时期陶器组”（表一）。该组墓葬普遍出有以A型I式铁锛、铁刮刀为代表的铁器，多见鼎、甑、盒、壶等三足陶器，出有铜盖弓帽和漆盒，这些相对晚近的因素值得注意。

表一 银山岭“战国墓”“文景时期陶器组”墓葬登记表^[25]

墓号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M73	长方形窄坑	陶盒、铜镞、铜镢、铜勺、铁锛AI、铁矛
M18	长方形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纺轮、铜盖弓帽、铁刮刀
M92	长方形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三足盒、铜剑、铜镞、铜盖弓帽、铁锛AI、铁刮刀、铁镞、砺石
M93	长方形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纺轮、铜勺、铁锛AI、铁刮刀
M129	长方形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鼎AI、陶纺轮、铜铃、铁锛AI、铁刮刀、漆盒
M115	长方形窄坑，设置腰坑，设置二层台，底铺卵石	陶杯、陶盒、陶鼎AII、陶甑、陶纺轮、铜勺、铁锛AI、铁刮刀
M3	长方形宽坑，设置二层台	陶杯、陶三足甑、铜剑、铜矛、铜镞、铜斤、铁锛AI、铁削、砺石
M15	长方形宽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甑、陶鼎B、陶罐、铜剑、铜斤、铜勺、铁锛AI、铁刮刀
M108	长方形宽坑，设置腰坑	陶三足盒、陶甑、陶三足盞耳罐、铜剑、铜镞、铜斤、铜鼎A、铜镢、铜杖头饰、铁锛AI、铁刮刀、铁凿、铁镞、砺石
M119	长方形宽坑，设置腰坑	陶钵、陶盒、陶三足壶、陶纺轮、铜斧、铜鼎B、铜勺、铜盆、残铁器、玉块

在 32 座（约总数的 1/4）不出 A 型 I 式铁锛或铁刮刀（包括不出铁器、铁器不明）的战国墓^[26]中，M42 出有三足陶盒、M71 出有三足陶甑、M102 出有三足盪耳陶罐和铜盖弓帽、M14 出有铜盖弓帽，器物组合与“文景时期陶器组”相似。其余 28 座墓中，M4 等 7 座墓^[27]出有铁斧、铁削、B 型铁锛、铁铤铜镞等器物，其他 21 座不出铁器的墓葬与“铁器墓”的形制、器物组合差别不明显。这些情况表明银山岭“战国墓”的主体年代确实进入秦汉纪年，而且相差不至很悬殊。

银山岭“战国墓”普遍出有各类铁制农具、工具和铁矛、铁鼎等兵器、生活用器，甑、盒、壶等三足陶器有别于岭南战国时期以平底为主的陶器传统，M14 等 8 座墓的铜盖弓帽是岭南战国墓未曾出现的新器类，铜带钩、“江、鱼”铜戈为中原形制，“孱陵”铜矛来自楚地。诸多岭南本土以外的文化因素（图二）说明，银山岭“战国墓”的主体年代当在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引发的社会变革之后，从历史背景看可能就是“秦定岭南”^[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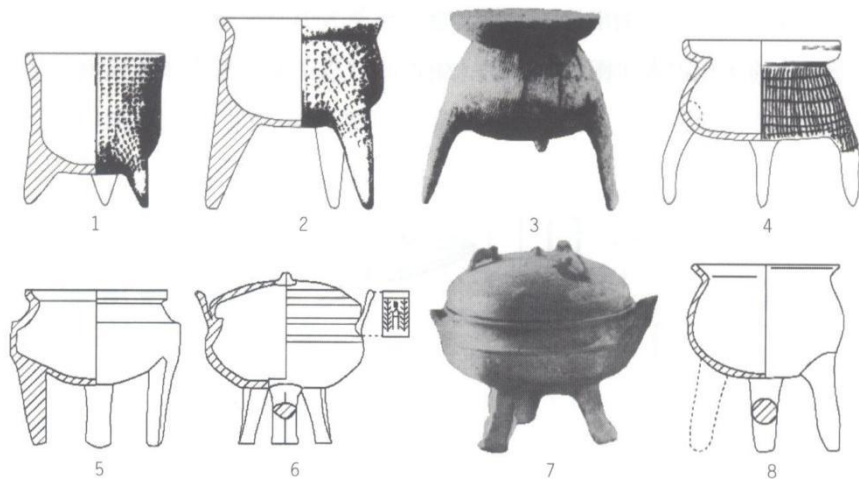
1. 铁刮刀 (M115:9) 2. A 型 I 式铁锛 (M55:29) 3. 铜盖弓帽 (M102:4)
4. 铜带钩 (M98:4) 5. “江、鱼”铜戈 (M4:4) 6. “孱陵”铜矛 (采:7)

图二 银山岭“战国墓”相对晚近的文化因素

三、部分器物的型式调整及年代判断

银山岭墓地发掘报告中一些器物的型式划分不尽贴妥，包括作为汉墓分期重要线索的陶釜和陶杯^[29]。为便于讨论分期等问题，我们对发掘报告中可能具有年代学意义的陶鼎、铁锛、铁斧、铜鼎等器物的型式酌情加以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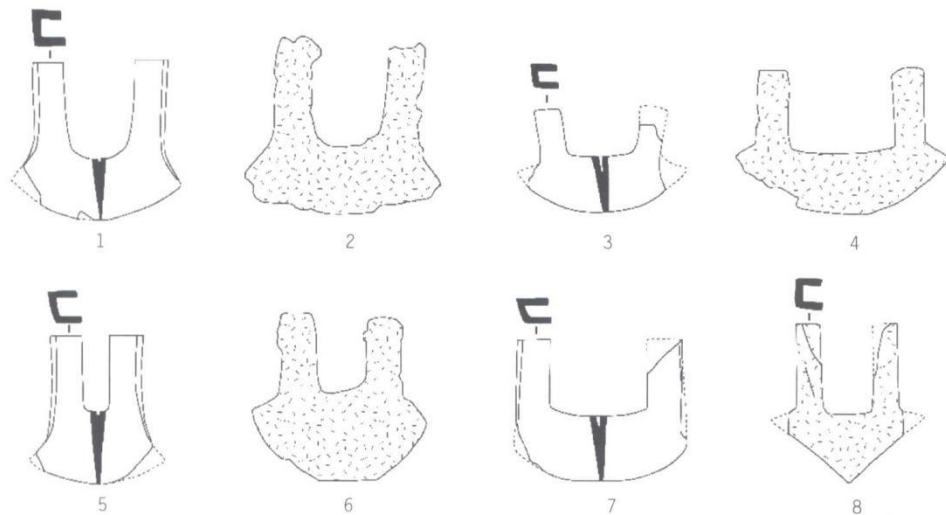
战国墓发掘报告将陶鼎分为三式，其中 I 式、II 式为夹砂褐胎，III 式为泥质灰陶。汉墓发掘报告将陶鼎分为两式，I 式为夹砂粗陶，暗红色或紫褐色胎，报告介绍与战国墓 I 式鼎造型相同、制法类似；II 式为泥质灰陶。观察图照，原战国墓 I 式 (M129:3)、II 式 (M115:6) 和原汉墓 I 式 (M33:2) 宜分别称为 A 型 I、II、III 式 (图三:1~3)，原战国墓 III 式 (M15:4) 宜称为 B 型 (图三:5)，原汉墓两件 II 式鼎 (M134:21、M53:5) 宜分别称为 C 型 I、II 式 (图三:6、7)，原归入汉墓 I 式的一件“钵形腹，三乳状足”陶鼎 (M143:2，无图照) 宜划分为 D 型。



1. A型I式(M129:3) 2. A型II式(M115:6) 3. A型III式(M33:2) 4. 钟山张屋M1:33 5. B型(M15:4)
6. C型I式(M134:21) 7. C型II式(M53:5) 8. 合浦文昌塔M57:2 (1、2、5. 银山岭战国墓出土, 3、6、7. 银山岭汉墓出土)

图三 银山岭及相关墓地出土陶鼎

“文景时期陶器组”的M129、M115分别出有A型I式、II式陶鼎，M115的A型II式陶鼎与合浦文昌塔墓地南越国后期陶鼎相似^[30](M57:2, 图三:8), 钟山张屋^[31](M1:33)陶鼎(原称三足釜, 图三:4)可以列入A型陶鼎演变序列, 年代为东汉晚期偏晚。根据类型学原理, A型I式陶鼎的年代约为文景时期及其之前(南越国前中期), A型II式陶鼎的年代约为文景时期至武帝前期(南越国中后期), A型III式陶鼎的年代约在西汉后期。出有B型陶鼎的M15属于“文景时期陶器组”, C型陶鼎多见于岭南地区东汉墓, 年代大致可以判断。



1、2. A型I式(M55:29. M92:12) 3、4. A型II式(M2:12. M117:15) 5. B型I式(M42:4)
6. 8型II式(M145:3) 7. C型(M61:1) 8. D型(M27:9) (1、2、5~7. 战国墓出土, 3、4、8. 汉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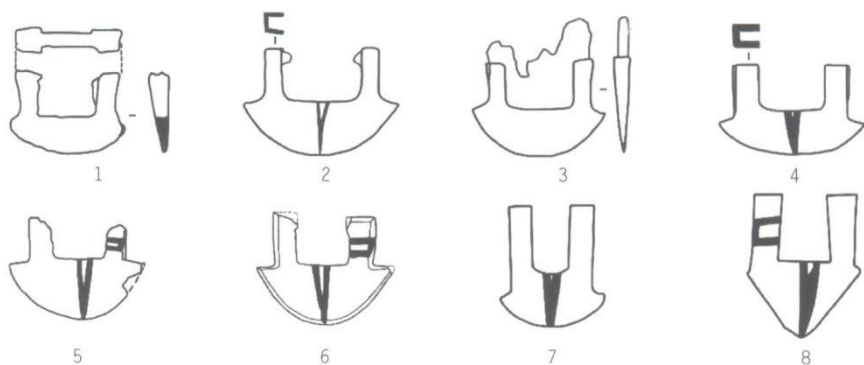
图四 银山岭墓地出土铁锄

战国墓、汉墓发掘报告将铁锄(原称铁锄)各自划分为四式, 其中汉墓发掘报告介绍其I式同于战国墓III式, II式同于战国墓IV式, III式、IV式未见于战国墓。我们

将原战国墓Ⅰ式的2件(M55:29、M92:12)划分为A型Ⅰ式,原汉墓Ⅳ式的2件(M2:12、M117:15)划分为A型Ⅱ式(陶四:1~4);将原战国墓Ⅱ式(M42:4)划分为B型Ⅰ式,原战国墓Ⅲ式(M145:3)和原汉墓Ⅰ式划分为B型Ⅱ式(图四:5、6);将原战国墓Ⅳ式(M61:1)和原汉墓Ⅱ式划分为C型,将原汉墓Ⅲ式(M27:9)划分为D型(图四:7、8)。

A型铁锛两个銜口间距较宽,广州汉墓(M1005:18)、贵县罗泊湾汉墓(M1:283)和广州象岗南越王墓(B41:41)的西汉前期铁锛(图五:1~3),以及合浦堂排(M2B:5,西汉晚期)、乐昌对面山(M124:15,东汉后期)、钟山张屋(M1:18,东汉晚期偏晚)的铁锛(图五:4~6)可以列入A型铁锛演变序列。与序列中的东汉铁锛比较,A型铁锛刃角上抬、腰沿(銜口与刃角之间)从弧曲渐成折角、直角的变化趋势明显。A型Ⅰ式铁锛与广州汉墓M1005相似,出有此型式铁锛的M92属于“文景时期陶器组”,流行年代约在西汉前期(南越国前期、中期);A型Ⅱ式铁锛与贵县罗泊湾M1、南越王墓、合浦堂排M2B相似,年代跨度较大,可以沿续至两汉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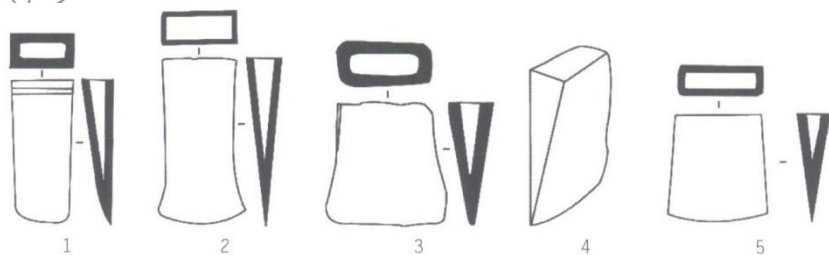
B型铁锛两个銜口间距较窄,刃角上抬不明显、腰沿较弧曲属于早期特征,西汉早期的临淄齐王墓(K4:01,图五:7)出有相似形制,年代基本与A型Ⅰ式相当。出有D型铁锛的M27同出文帝半两,湖南资兴西汉中期墓(M211:1,图五:8)铁锛与D型略相似,D型铁锛年代为西汉前、中期。C型铁锛战国墓出土4件,其中战国墓M50、M61同出A型Ⅰ式铁锛(M61还同出三足陶盆),M151同出B型Ⅰ式铁斧(参见下文),汉墓3件(M47、M131、M132)均属于第一类汉墓(参见下文),年代大致在西汉前期。



1. 广州汉墓(M1005:18) 2. 贵县罗泊湾(M1:283) 3. 南越王墓(B:41) 4. 合浦堂排(M2B:5)
5. 乐昌对面山(M124:15) 6. 钟山张屋(M1:18) 7. 临淄齐王墓(K4:01) 8. 资兴(M211:1)

图五 相关铁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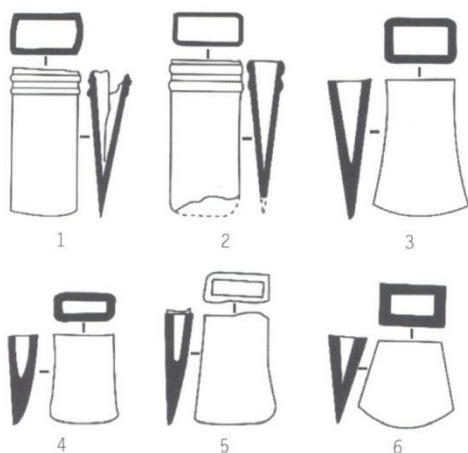
战国墓发掘报告将10件铁斧划分为三式,汉墓出土的3件未划分式别。我们将原战国墓Ⅰ式铁斧(M8:4)划分为A型,原战国墓Ⅱ式(M160:10)、Ⅲ式(M17:7)划分为B型Ⅰ式、Ⅱ式(图六:1~3),将汉墓发表图照的2件(M27:6、M27:8)划分为C型(图六:4、5)。



1. A 型(H8:4) 2. B 型 I 式(M160L10) 3. B 型 II 式(M17:7)
4、5. C 型(M27:6、M27:8) (1~3. 战国墓出土, 4、5. 汉墓出土)

图六 银山岭墓地出土铁斧

A 型铁斧与战国晚期的辽宁宽甸黎明村窖藏、内蒙古赤峰老虎山遗址铁斧较为相似(图七:1、2), 釜口处均有数周凸带; 出有 A 型铁斧的 M57 同时出有 A 型 II 式陶鼎(文景时期至武帝前期)。与 B 型相似的束腰铁斧见于福建崇安汉城和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图七:3~5), 推测 B 型铁斧的年代不晚于武帝前期。C 型铁斧梯形、直腰、斧身较宽, 其中一件(M27:8)与兴安七里圩“秦城”遗址出土的铁斧略相似(图七:6)。出有 C 型铁斧的 M27 同出文帝半两和 D 型铁锛, 年代大致不晚于西汉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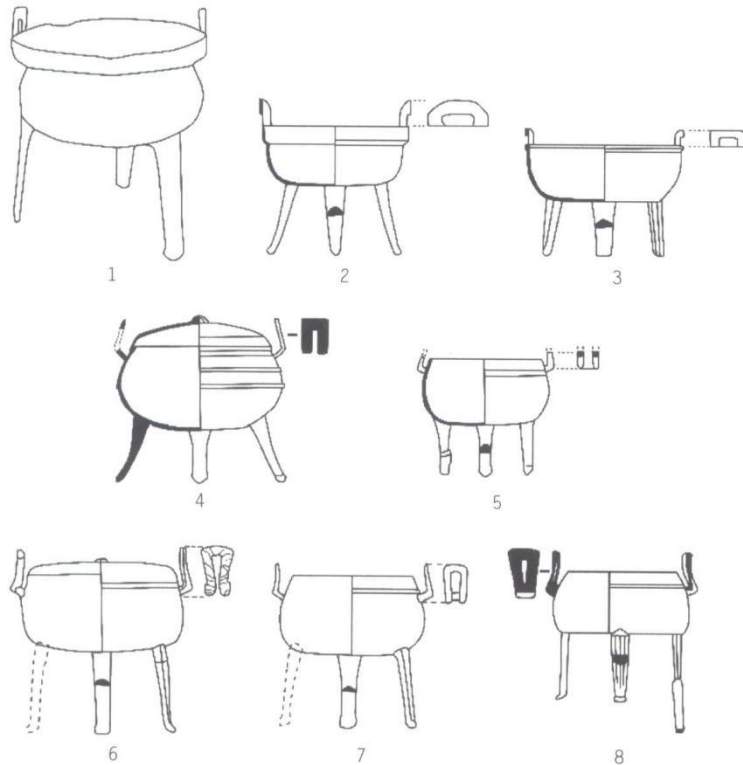
1. 宽甸黎明村窖藏(LMD:05) 2. 赤峰老虎山遗址 3、4. 崇安汉城(T287:36、T135:5)
5.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C:145-5) 6. 兴安七里圩“秦城”遗址(OLW91T5:15)

图七 相关铁斧

此外, 发表图照的 5 件铜鼎可以划分为两型。汉墓(M51:1)和战国墓(M71:1)2 件盘口铜鼎宜划分为 A 型(图八:1、2), 战国墓 1 件立耳铜鼎(M119:17)宜划分为 B 型(图八:3), 战国墓 2 件附耳铜鼎(M22:14、M110:12)宜划分为 C 型(图八:4、5)。

参照郑小炉对百越地区越式铜鼎的研究^[32], 银山岭墓地发表图照的 5 件铜鼎不至早于战国前期。出有 A 型铜鼎的 M108 和出有 B 型铜鼎的 M119 属于“文景时期陶器组”。C 型铜鼎与湖南资兴战国中期墓(M165:4、M326:2, 图八:6、7)和西汉前期墓(M69:2, 用铁筒套接残足, 图八:8)所出铜鼎相似, 但是足部明显变短, 资兴 M69 约在文景时期, 可为年代参考。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1、2. A型 (M51:1、M71:1) 3. B型 (M119:17) 4、5. C型 (M22:14、M110:12) 6. 资兴旧市 M165:4
7. 资兴旧市 M326:2 8. 资兴 M69:2 (1. 银山岭汉墓出土, 2~5. 银山岭战国墓出土)

图八 银山岭及相关墓地出土铜鼎

四、发掘报告的汉墓分期及打破关系

银山岭汉墓发掘报告根据陶器组合关系将墓葬分为三类。

第一类墓葬 9 座，陶器组合以杯为主，仅 M5 为宽坑墓。报告认为，这种随葬少量陶器的小墓与当地战国墓相似，只是随葬有战国墓中不曾出现过的新器形，如陶四联罐、半两铜钱、铁长剑和铁刀等。这 9 座墓与未出陶器的 M59、M131、M138 和仅出陶纺轮的 M157 被推定在西汉前期（表二）。

表二 银山岭第一类汉墓登记表

墓号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备注
M45	窄坑，设置腰坑、底铺卵石	陶杯、陶纺轮、铁刀	
M48	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罐、陶纺轮、残铜器、铁刀、铁刮刀	
M83	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纺轮	
M47	窄坑	陶杯、C 型铁锛	
M132	窄坑	陶杯、陶纺轮、C 型铁锛、铁钩残器	
M44	窄坑	陶杯、铁刀	
M59	窄坑	铜镞、A 型 II 式铁锛	附入第一类汉墓

墓号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备注
M131	窄坑, 设置二层台	铁锛 C、铁刀	附入第一类汉墓
M138	窄坑	铁刀	附入第一类汉墓
M157	窄坑	陶纺轮、铁刀	附入第一类汉墓
M27	窄坑, 设置腰坑、底铺卵石	陶杯、铜剑、铜矛、铜镞、半两、C 型铁斧、D 型铁锛、铁剑	归入文景时期陶器组
M51	窄坑, 设置腰坑	陶杯、陶瓮、陶罐、陶四联罐、陶纺轮、A 型铜鼎、铜盘、铜勺、铜剑、铜镞、A 型 I 式铁锛、铁刮刀、铁斧、砺石	归入文景时期陶器组
M5	宽坑	陶杯、陶盒、A 型 I 式陶鼎、陶纺轮、铜鼎	归入文景时期陶器组

第二类墓葬 9 座, 宽坑墓, 陶器组合以釜为主。报告认为, 陶杯、陶釜不共出, 说明杯、釜两者有替代关系。M97 出土的武帝五铢和宣元五铢, 与釜伴出的细颈、胆形腹、高圈足的陶壶, 在广西各地都是西汉后期才流行的。这 9 座墓和无釜而有钵的 M23 的年代被推断为西汉后期 (表三)。

表三 银山岭第二类汉墓登记表

墓号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备注
M87	宽坑, 设置腰坑和二层台、底铺卵石	陶釜、陶罐、铁刀	
M94	宽坑, 设置腰坑和二层台	陶釜、陶壶、陶灯、铜盘、铜牌饰、铁刀	
M97	宽坑, 设置腰坑和二层台	陶釜、铁刀、铁削、五铢	
M100	宽坑, 设置腰坑和二层台、底铺卵石	陶釜、石砚	
M101	宽坑, 设置二层台	陶釜、陶圈足杯、陶纺轮、铁刀	
M127	宽坑, 设置腰坑	陶釜、铁刀、铁链	
M137	宽坑, 底铺卵石	陶釜、铁刀	
M142	宽坑, 设置腰坑	陶釜、陶壶	
M149	宽坑, 设置腰坑	陶釜、A 型 II 式铁锛、铁刮刀	
M23	宽坑	陶钵、A 型 II 式和 D 型铁锛、铁刀	归入第一类汉墓

第三类墓葬 22 座, 陶器组合以鼎、碗 (盆)、罐为主, 其中宽坑墓 2 座, 其他均为带墓道土坑木椁墓, 发掘报告将第三类墓分为前、后两期, 其中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各 11 座^[33]。

综上, 发掘报告将银山岭汉墓分为三期, 计西汉前期 13 座, 西汉后期 21 座, 东汉前期 11 座, 其中第一、二类汉墓随葬器物的年代特征与前面分析基本吻合, 逻辑序列较可靠, 需要调整的是第一类汉墓的 M27、M5、M51 和第二类汉墓的 M23。

第一类汉墓多见铁刀、A型Ⅱ式和C型铁锛，少见青铜兵器、容器，与M27、M5、M51随葬器物差别较大。M27出有文帝半两，M5出有铜鼎和A型Ⅰ式陶鼎，M51出有A型Ⅰ式铁锛和A型铜鼎，都与文景时期陶器组的年代更为接近。M23出有陶钵和D型铁锛，报告介绍陶钵似战国Ⅱ式杯但腹浅而大，前文分析D型铁锛年代约为西汉前、中期，M23宜归入第一类汉墓。后文相关讨论均依本文调整。

战国墓和汉墓发掘报告列出M157→M155、M132→M146、M5→M6、M14→M26和M149→M154计5组打破关系（表四），结合打破关系，能够判断部分随葬器物的相对早晚关系。

表四 银山岭墓地打破关系登记表

打破关系	墓号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M14→M26	M14（战国墓）	宽坑	铜剑、铜盖弓帽
	M26（战国墓）	宽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钵、陶瓮、铜矛、铜镞、铜勺、A型Ⅰ式铁锛、铁削、铁刮刀、砺石
M5→M6	M5（文景时期陶器组）	宽坑	陶杯、陶盒、A型Ⅰ式陶鼎、陶纺轮、铜鼎
	M6（战国墓）	宽坑	陶杯、陶盒、陶纺轮、A型Ⅰ式铁锛、铁刮刀
M132→M146	M132（第一类汉墓）	窄坑	陶杯、陶纺轮、铁锛C型、铁钩残器
	M146（战国墓）	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陶三足盒、A型Ⅰ式铁锛、铁刮刀、玉块、砺石
M157→M155	M157（第一类汉墓）	窄坑	陶纺轮、铁刀
	M155（战国墓）	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A型Ⅰ式陶鼎、铜剑、铜矛、铜镞、铜矩、A型Ⅰ式铁锛、铁刮刀、砺石
M149→M154	M149（第二类汉墓）	宽坑，设置腰坑	陶釜、铁锛A型Ⅱ式、铁刮刀
	M154（战国墓）	窄坑，设置腰坑	陶杯、陶盒、铜剑、铜镞、A型Ⅰ式铁锛、铁刮刀、铁铤、砺石

(1) 在打破关系中，被打破的墓均出铁刮刀和A型Ⅰ式铁锛，出有铁刀的墓打破出有铁刮刀的墓(M157→M155)，出有A型Ⅱ式铁锛的墓打破出有A型Ⅰ式铁锛的墓(M149→M154)，出有C型铁锛的墓打破出有A型Ⅰ式铁锛的墓(M132→M146)。

(2) 文景时期陶器组多见A型Ⅰ式铁锛、铁刮刀；第一类汉墓不出A型Ⅰ式铁锛，M45等6座墓的铁刀、M59和M23的A型Ⅱ式铁锛、M47等3座墓的C型铁锛不见于文景时期陶器组，是相对晚近的文化因素，说明第一类汉墓整体晚于文景时期陶器组。

(3) 战国墓M57、M8的A型铁斧与A型Ⅱ式陶鼎、A型Ⅰ式铁锛或铁刮刀共出，M151、M21的B型Ⅰ式铁斧分别与C型铁锛或铜盖弓帽共出，M17的B型Ⅱ式铁斧与三足陶盒和铜盖弓帽共出，说明B型铁斧整体晚于A型铁斧。

五、银山岭墓地分期的若干观察点

(一) 关于墓葬形制的分期意义

银山岭墓地的窄坑墓（长宽比约为 3:1）、宽坑墓（长宽比约为 2:1）、带墓道土坑木椁墓及其设置腰坑、二层台、底铺卵石的情况见表五。

表五 银山岭墓地墓葬形制、设施登记表^[34]

	“战国墓”（110 座）			汉墓（45 座）		
	窄坑 （74 座）	宽坑 （33 座）	带墓道宽坑 （3 座）	窄坑 （12 座）	宽坑 （13 座）	带墓道宽坑 （20 座）
腰坑	60 座	24 座	3 座	5 座	7 座	无
二层台	8 座	15 座	2 座	1 座	5 座	8 座
底铺卵石	3 座	5 座	1 座	2 座	3 座	3 座

广州汉墓的窄坑墓均属于西汉前期。银山岭第一类汉墓只有 1 座宽坑墓，第二类汉墓全部是宽坑墓，第三类汉墓（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几乎均设置墓道，从窄坑墓至宽坑墓、带墓道土坑木椁墓的演变线索清楚。不过窄坑墓、宽坑墓的文化因素往往混杂，而且早于第一类汉墓的文景时期陶器组仍然窄、宽坑各半，因此窄坑、宽坑并不绝对具有分期意义。

战国墓和第一、二、三类汉墓均存在底铺卵石的情况，数量不多，年代意义不明显。文景时期陶器组几乎均设腰坑、个别设置二层台，第一类汉墓少量设腰坑、个别设置二层台，第二类汉墓基本设腰坑、大半设置二层台，第三类汉墓腰坑绝迹、二层台有一定数量，腰坑似乎流行于西汉后期及其前，二层台流行于西汉后期及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广州汉墓的腰坑主要与西汉前期的竖穴木椁墓而非与窄坑墓对应^[35]，不是最早期文化因素。

(二) 关于铁器、铜器和陶器的分期意义

银山岭战国墓出土铁器 181 件（墓均 1.6 件），汉墓出土铁器 68 件（墓均 1.5 件），墓均铁器数量基本持平，铁器的分期意义主要表现在种类（及其型式）方面。战国墓出有铜器 377 件（墓均 3.4 件），绝大多数为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331 件，近 9 成）；汉墓出有铜器 52 件（墓均 1.2 件），主要是鼎、釜等生活用具和钱币，青铜器尤其是兵器、生产工具（仅 10 件）衰退趋势明显。铜盖弓帽、铜杖头饰见于文景时期陶器组，不见于第一、二、三类汉墓，有可能作为分期线索。

战国墓和第一类汉墓多见陶杯、不出陶釜，第二类汉墓不出陶杯。战国墓的陶盒、陶鼎，文景时期陶器组的三足陶器、四联陶罐，第二类汉墓的陶四系罐、陶灯，第三类汉墓西汉后期墓的模型明器陶屋和四系罐、奩等陶器及滑石器，东汉前期墓的模型

明器陶井、陶灶和簠壶、卮、魁等陶器具有分期指征意义。

(三) 关于陶纺轮、砺石、玉块的年代意义

陶纺轮作为“性别代码”在银山岭墓地研究中颇受关注，36座战国墓中出有陶纺轮36件，20座汉墓中出有30件，汉墓似乎更流行，但是分期意义不明显。砺石在40座战国墓出有71件，汉墓中出有2件，其中3件(M3、M92、M51)属于文景时期陶器组，显然是较早期的文化因素。

玉块在15座战国墓中出有40件，汉墓未见，其中M119属于文景时期陶器组。M20等6座墓玉块与砺石同出，除M77、M106外均与铁器同出（基本为A型I式铁锛、铁刮刀），M22、M64与铜杖头饰同出，M64、M109、M146与三足陶盒同出。玉块亦是较早期的文化因素，但是流行年代下限较砺石为晚。

六、银山岭战国墓的分期线索

根据前面分析，铁器、腰坑及铜盖弓帽、铜杖头饰、三足陶器等有可能作为银山岭战国墓的分期线索。

第一组（不出铁器且不设置腰坑），包括窄坑墓7座(M9、M29、M40、M76、M88、M90、M144)、宽坑墓3座(M14、M30、M104)，随葬陶器和青铜兵器、工具多数简单，不出砺石。窄坑墓陶器主要是杯、纺轮，M76出有铜剑；宽坑墓M30、M104出有陶盒，M14出有铜盖弓帽。本组中的窄坑墓M9（还出有陶甗、陶钵）、M29（出有陶盒、铜剑、铜斧等）和宽坑墓年代较晚。

第二组（不出铁器且设置腰坑），包括窄坑墓9座(M13、M28、M77、M80、M84、M106、M107、M159、M163)、宽坑墓2座(M1、M71)、带墓道宽坑墓2座(M102、M110)，其中M28、M71、M102设置二层台，M102同属铜盖弓帽组和三足陶器组。

窄坑墓陶器和青铜兵器、工具一般较简单，陶器主要是杯、盒，M163、M13还分别出有A型I式、II式陶鼎，仅M77出土青铜兵器、工具较多，M77、M80出有砺石。宽坑墓和带墓道宽坑墓还出有瓮、罐、三足盩耳罐、三足甗等陶器，青铜兵器、工具、容器（鼎、盆、盘）数量较多，M71等3座墓出有砺石。本组年代整体晚于前组，窄坑墓中的M28（设置二层台）和宽坑墓、带墓道宽坑墓的年代晚于其他窄坑墓，带墓道宽坑墓年代更晚。

第三组（铜盖弓帽组），包括窄坑墓5座(M17、M18、M21、M92、M156)、宽坑墓2座(M14、M58)、带墓道宽坑墓1座(M102)。除M14外均设置腰坑，M17、M102设置二层台，仅M14和M102不出铁器，铁器见有A型I式锛、B型斧、刮刀、斨、削等，陶器见有杯、盒、甗、三足盒等，M17等4座墓出有砺石。M18和M92同属文景时期陶器组，M17、M156、M102同属三足陶器组。本组整体与文景时期陶器组年代相当。M21、M17

分别出有 B 型 I 式、II 式铁斧，同属铁斧组，年代较晚。

第四组（铜杖头饰组），包括窄坑墓 3 座（M22、M55、M57）、宽坑墓 3 座（M64、M74、M108）。除 M55 外均设置腰坑，M55、M64 设置二层台，均出有 A 型 I 式铁锛，M57 出有 A 型铁斧，其他铁器有刮刀、铤、凿、削、矛等；陶器有 A 型 II 式鼎、杯、盒、甑、三足盒、三足盞耳罐等，青铜兵器、工具、容器较多，M55 等 4 座墓出有砺石。M108 同属文景时期陶器组，本组整体与文景时期陶器组年代相当。

第五组（三足陶器组），包括窄坑墓 9 座（M17、M25、M42、M61、M78、M86、M92、M109、M156）、宽坑墓 6 座（M3、M64、M71、M145、M168、M119）、带墓道宽坑墓 1 座（M102）。其中 M3、M168 设置二层台，M17、M71、M64、M102、M145 设置腰坑和二层台，其余各墓均设腰坑。M3、M92、M119 同属文景时期陶器组，M17、M92、M102、M156 同属铜盖弓帽组，M64 同属铜杖头饰组，M17 同属铁斧组。

本组各墓均随葬铁器（M71 出有铜铁合制三棱镞），以 A 型 I 式锛、刮刀最普遍，陶器见有杯、三足盒、三足甑、三足壶、三足盞耳罐、盒、钵、纺轮等，青铜兵器、工具、容器丰富，M64 等 8 座墓出有砺石。本组整体与文景时期陶器组年代相当，出有 B 型 II 式铁斧的 M17 和分别出有 B 型 I 式、B 型 II 式、C 型铁锛的 M42、M145、M61 年代较晚。

第六组（铁斧组），包括窄坑墓 7 座（M17、M21、M56、M57、M151、M152、M160）、宽坑墓 3 座（M4、M8、M82）。除 M151 外均设置腰坑，M17 和 3 座宽坑墓设置二层台。M8、M57 出有 A 型铁斧，其余墓出有 B 型铁斧。M17、M21 同属“铜盖弓帽组”，M57 同属铜杖头饰组。

陶器多见杯、盒、钵、甑、罐、三足盒、鼎等，青铜兵器、工具一般较多（M56、M152 不出铜器）；其他铁器有 A 型 I 式和 C 型铁锛、铁刮刀、铁鼎等；M8 等 6 座墓出有砺石。本组年代整体晚于文景时期陶器组，但是出有 A 型铁斧的 M8、M57（同出 A 型 II 式陶鼎）、出有 B 型陶鼎的 M82 年代较早，A 型 I 式铁锛仅见于这 3 座墓。

七、银山岭墓地的逻辑分期框架

前述各组打破关系中，除汉墓打破战国墓、宽坑墓打破窄坑墓外，战国墓之间、宽坑墓之间、窄坑墓之间、腰坑墓之间也有打破关系；仅出铜器的墓也有打破铁器墓者；除出有铁刀的墓打破出有铁刮刀的墓外，出有铁刮刀的墓之间也有打破关系，早、晚期文化因素交织混杂，不能截然分开，暂且只能根据逻辑线索划分出期段框架。

第 1 段：以不出铁器、不设置腰坑为考察标准，包括第一组的多数窄坑墓，陶器多为杯、纺轮，青铜兵器、工具少见。

第 2 段：以不出铁器、设置腰坑为考察标准，包括第二组的多数窄坑墓，陶器多

见杯、盒、纺轮，出现陶鼎；青铜兵器、工具数量略多。

第3段：包括前两组的宽坑墓和少量窄坑墓（M9、M28、M29等）。出现宽坑墓、二层台和铜盖弓帽、三足陶甑等新的文化因素，腰坑较普遍，青铜兵器、工具丰富，不出铁器。

第4段：以文景时期陶器组为代表，包括第二组的M102、M110，铜盖弓帽组、铜杖头饰组、三足陶器组的大多数墓，铁斧组的M8、M57、M82，以及原归入第一类汉墓的M27、M51、M5等。宽坑墓和盒、甑、壶等三足陶器增多，出现带墓道宽坑墓和陶四联罐，腰坑普遍，二层台有一定数量，青铜兵器、工具较丰富，鼎、盆等青铜容器增多，普遍出有A型I式铁锛、铁刮刀，多见砺石，随葬半两。

第5段：以调整后的第一类汉墓为代表，还包括“铁斧组”的多数墓葬，三足陶器组的M17、M42、M145、M61，原归入第二类汉墓的M23等。窄坑墓、宽坑墓仍然共见，腰坑较普遍，有少量二层台，陶杯、陶纺轮仍然较多；多见铁刀、A型I式以外的其他型式铁锛、A型和B型铁斧等，青铜兵器、工具衰退。

第6段：即调整后的第二类汉墓。流行宽坑墓，腰坑、二层台较普遍；不出陶杯，流行陶釜，出现陶壶；流行铁刀，出有A型II式和D型铁锛，偶见铁刮刀，青铜兵器、工具绝迹，随葬五铢。

第7段：即第三类汉墓中的西汉后期墓。以带墓道土坑木椁墓为主，腰坑绝迹，二层台有一定数量，出有四系罐、灯等陶器和模型明器陶屋，滑石器较多见。

第8段：即第三类汉墓中的东汉前期墓。均为带墓道土坑木椁墓，二层台有一定数量，出有卮、魁、铎壶等陶器及模型明器陶井、灶等。

以第4段（文景时期）、第7段（西汉后期）为年代参照，约略可以推断其他各期段的年代。第1、第2段不出铁器，未见外来文化因素，推断年代在秦文化进入岭南之前、之初，分别相当于战国晚期和秦代前后。第3段不出铁器，见有铜盖弓帽、三足陶器等新因素，结合“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36]所反映的铁器匮乏的历史背景，推断年代在高祖吕后阶段（南越国前期）。第5段出现铁刀，铁器种类丰富，但是铁刮刀、陶杯等早期文化因素仍然存留，与第4段年代衔接，约为武帝前期（南越国后期）。第6段不出陶杯，青铜兵器、工具基本绝迹，推断年代在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至昭宣时期）。第8段年代明确，为东汉前期。以上8段台并为五期（表六）

表六 银山岭墓地分期及文化特征

期段	年代		墓葬形制	随葬器物			
				陶器	铜器	铁器	
第一期	1段	战国晚期	窄坑	以杯、纺轮为主	兵器、工具少见	无	
	2段	秦代前后	窄坑，流行腰坑	以杯、盒、纺轮为主	兵器、工具略多	无	
第二期	3段	南越国	高祖吕后	出现宽坑墓、二层台，腰坑较普遍	出现甗、盩耳罐等三足陶器	兵器、工具丰富，出现盖弓帽	无
			文景	宽坑墓增多，个别带墓道。腰坑普遍，有一定数量二层台	鼎、盒、壶、甗等三足陶器增多，出现四联罐	兵器、工具较丰富，鼎、盆等容器增多，随葬半两	多见刮刀、A型I式锛，出现D型锛和A型、C型斧
			武帝前期	窄坑墓、宽坑墓共见，腰坑较普遍，有少量二层台	杯、盒、纺轮仍较多见	兵器、工具衰退	多见刀，出现其他型式锛、斧
第三期	6段	西汉中期(武帝后期、昭宣)	宽坑墓，腰坑、二层台较多	不见杯，流行釜，出现壶	兵器、工具绝迹，随葬五铢	多见刀，出有A型II式和D型锛	
第四期	7段	西汉后期	以带墓道土坑木椁墓为主，腰坑绝迹，有一定数量二层台	出现四系罐、灯等陶器和模型明器房屋	盘、盩、釜壶等	刀、斧、锛、削、凿、锅架等	
第五期	8段	东汉前期	带墓道土坑木椁墓	有一定数量二层台	出现卮、魁、釜壶等陶器以及模型明器井、灶	鼎、釜、刀、锛、镰、削、凿、锅架等	

本文对于银山岭墓地年代学问题的讨论主要基于墓葬形制和器物种类的变化，各组别的划分和表六归纳的各期段特征表现的仅是逻辑演变趋势，具体分期仍然有待于系统的类型学研究。除层位学、类型学外，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还应该包括年代学，在考古报告中尽可能地获取和利用年代学信息，也是本文写作目的所在。

(原载于《新果集(二)——庆祝林沅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72页。
- [4]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4-182页。
- [5] 黄展岳:《两广汉墓的发掘与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第436-442页。
- [6]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7] 黄展岳,麦英豪:《从南越墓看南越国》,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449-465页。
- [8] 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载蒋炳钊主编《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第394-413页。
- [9]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10]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11]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132页。
- [12] 高至喜认为银山岭墓地出土的鼎、矛、“凹”字形锄、斧、刮刀等铁器以及铁足铜鼎等铜铁合金器来自楚地。参见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34页。
- [13] 杨建军:《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 [14] 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5] 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载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考古辑刊1》,岳麓书社,1982;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载蒋炳钊主编《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第394-413页。
- [1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 [17]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 [18]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289、270页。
- [19] 何安益、宁永勤:《桂东北和西江中游区东周越人土坑墓及族属探讨——以墓葬随葬陶器为例》,载安徽大学历史系等合编《百越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第105-112页。
- [20]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灌阳古城岗战国墓》,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94-100页。
-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灵川马山古墓群清理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28-237页。
-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州市高屋背岭古墓群勘探与试掘》,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58-264页。
-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兴安石马坪汉墓》,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38-258页。
- [24]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313、315-316页。本文图五、图六、图七的部分铁锄、铁斧线图引自白著。
- [25] 器物名称、型式依本文调整,下文各表同。
- [26] 墓号为M1、M4、M9、M13、M14、M17、M28、M29、M30、M40、M42、M56、M60、M71、M76、M77、M80、M84、M88、M90、M102、M104、M106、M107、M110、M113、M119、M144、M159、M160、M161、M163。

[27] 墓号为 M4、M17、M60、M113、M119、M160、M161。

[28] 洪德善：《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探讨》，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 78-87 页。

[29] 战国墓发掘报告将陶杯划分为三式，从发表线图看分式标准不一，而且有些陶杯与陶钵（M22: 4）不易区分。汉墓出土陶釜 47 件，I 式“小平底”，II 式“略同”，III 式“与 I、II 式略同”，但是发表线图的 III 式（M112: 21）为圜底；发表线图的 I 式釜（M125: 22）其实是陶罐，报告亦称陶釜“形制像小罐”。

[3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中山大学课题组：《合浦地区南越国时期遗存辨识及南越国政权治下整体社会面貌观察》（内部资料），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2018。

[3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广西钟山县张屋村汉、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 年第 1 期。

[32]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 92-98 页。

[33] 经核对发掘报告正文，M150 属于西汉后期（二期），墓葬登记表误记为东汉前期（三期）

[34] 根据发掘报告墓葬登记表统计，与报告正文个别有出入。

[35] 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的 15 座长方形窄坑墓中有 1 座设二层台，19 座竖穴木椁墓中有 5 座设腰坑、13 座底铺河卵石、1 座置二层台。材料出自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36] [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59，第 2969 页。